

# 宋代民間藏書與地方文化發展之關係： 以四川地區為例\*

鄒重華

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

教育和學術研究都離不開書籍，在中國傳統社會，民間藏書與地方文化發展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吳晗即論及研究民間藏書家的文化史意義。他說：「〔民間藏書〕其有功於社會文化者亦至鉅。……學者苟能探源溯流，鉤微掘隱，勒藏家故實為一書，則千數百年來文化之消長，學術之升沉，社會生活之變動，地方經濟之盈虧，故不難一一如示諸掌也。」<sup>1</sup> 1997年末，杭州大學歷史系舉辦了「中國古代藏書樓國際學術研討會」，其後將與會者提交會議的論文三十餘篇結集出版。<sup>2</sup> 其中不少學者都試圖探討民間藏書的文化意義，徐雁的〈80年代以來中國歷史藏書研究成果綜述〉一文，對二十世紀以來中國藏書文化的研究進行了系統的清理。1999年，有兩部較有分量的藏書文化論著同時出版，一部是周少川的《藏書與文化》，另一部是李雪梅的《中國近代藏書文化》。<sup>3</sup> 兩位學者花費了不少心力，對中國古代和近代藏書文化，分別作了系統的研究。然而，迄今為止，由於缺乏對各個藏書發達地區進行深入和具體的區域性個案研究，使通論式的研究常常落不到實處，或立論出現偏差。有鑑於此，筆者擬以宋代四川為例，探討中國

\* 本文在修改過程中，粟品孝博士曾提出很有價值的修改意見；又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審閱並提出寶貴意見，才使拙文得以現在的面貌刊出。特此一併致謝！筆者亦對供職的京港學術交流中心（香港）所給予的支持表示感謝！

吳春晗（吳晗）：〈江蘇藏書家小史〉，《圖書館學季刊》第八卷第一期（1934年3月），「序言」，頁1-2。

黃建國、高躍新（主編）：《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李雪梅：《中國近代藏書文化》（北京：現代出版社，1999年）。



傳統社會中民間藏書與地方文化發展之間的關係，期拋磚引玉，俾有更多的學者重視區域性的個案研究，使中國藏書文化的研究，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基礎之上。<sup>4</sup>

### 民間藏書源流(先秦至宋)

中國私人藏書歷史源遠流長，一般認為起於春秋戰國，儒家宗師孔子(藏有《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書籍)、縱橫家蘇秦(有書十篋)及哲學家惠施(有書五車)被視為早期的藏書家。秦始皇「焚書坑儒」，禁止私人藏書。西漢廢除挾書禁令，私人藏書合法化，至東漢末年，出現淮南王劉安、河間王劉德、蔡邕(據說有書萬卷)、卜圭、富參等一些有名的藏書家。

劉汝霖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私家藏書〉和〈隋唐五代時期的私家藏書〉二文，對這兩個時期藏書家的情況進行了清理。<sup>5</sup>計魏晉(220-316)有七人，藏書數百卷至萬卷不等；東晉及宋(317-478)有六人，藏書量有一家記為數千卷，另五家不詳；南朝齊、梁、陳(479-528)有十六人，藏書數千卷至三萬卷不等；北朝有十七人，藏書千餘卷至萬餘卷不等；隋代有六人，藏書數千卷至萬卷不等；唐前期有十二人，藏書數千卷至二萬卷不等；唐後期有十三人，藏書千卷至二萬卷、三萬軸不等；殘唐五代有十三人，藏書數千卷至萬卷不等。劉氏稱南朝時「收藏數量達到一、兩萬卷，是很常見的」，其實不確。正如劉氏談到北朝私人藏書之難時所言：「全憑刻苦勤學之士，親自抄錄，才能逐漸聚集大量的書籍。」南宋著名學者魏了翁云：「余嘗聞長老言，書之未有印本也，士得一書，則口誦而手抄，惟恐失之，其傳之艱蓋若此。」<sup>6</sup>在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前，這是各地私人藏書所面臨的普遍困難。

劉氏談到私人藏書的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即唐代前期公私藏書事業的重心在長安，安史之亂後，藏書事業不再集中於京城，而是各地方藏書家紛紛興起。由劉氏所列唐前期、後期及五代三個時期藏書家情況表，可以看出這種變化。唐代的兩個表中，蜀地無一藏書家，而五代十三名藏書家中，蜀中即佔三名，且其中可斷定為唐五代遷蜀的，即有成都毋昭裔、眉山孫長孺二名。藏書重心由長安一地

<sup>4</sup> 吳天墀撰〈宋代四川藏書考述〉(原刊《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收入《吳天墀文史存稿》〔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89-204)，對宋代四川的藏書家及公私藏書作了系統的清理。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掘史料，並試從文化史的角度，以宋代四川為例，探討民間藏書與地方文化發展之關係。

<sup>5</sup> 《圖書館》(北京：北京圖書館)1961年第3期，頁57-59；1962年第1期，頁52-55。

<sup>6</sup>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以下簡稱《鶴山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宋刊本，卷四一〈眉山孫氏書樓記〉，頁353。

向多地轉變，顯示了學術重心的轉移及多中心格局的出現。而民間藏書興盛，為教育的普及和學術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宋代藏書之風很盛，動輒藏書上萬卷，多者四、五萬至十萬卷。<sup>7</sup>如後周宰相、宋初進位司空的王溥(922-982)，性好聚書，宋太祖平吳、蜀，所獲文史副本分賜大臣，王溥獲得不少，藏書增至萬餘卷。<sup>8</sup>曾主持修撰《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書的李昉(925-996)，藏書亦極富。<sup>9</sup>官至執政的宋綬(991-1040)，為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宋綬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至其子宋敏求時，藏書達三萬卷，皆略誦習，著書甚多。<sup>10</sup>北宋衛州(治今河南汲縣)人賀鑄(1052-1125)，辭官後退居吳下，家藏書萬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誤。<sup>11</sup>東都(開封)劉氏無他嗜好，為布衣而所蓄書可與秘閣相比。<sup>12</sup>吳郡(今蘇州)人張廷傑(1111-1176)家藏書數千卷，士大夫喜從之遊。<sup>13</sup>南宋紹興時莆田(福建莆田)人方于寶，家有「三餘齋」，聚書數萬卷。<sup>14</sup>茶陵(今湖南茶陵)人陳宗說建汲古堂，藏書萬卷。<sup>15</sup>南宋末豐城(今江西豐城)人徐欽家藏書數萬卷，無不覽記。<sup>16</sup>宋初治蜀及開蜀中士子嚮學求仕風氣之先的張詠，亦是一位藏書家。張詠平生嗜書，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有《乖崖集》十二卷存世。<sup>17</sup>

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sup>18</sup>收錄兩宋藏書家計一百二十八人，比前述劉汝霖所

- 7 參見周密：《齊東野語》(上海：上海書店影印涵芬樓舊版，1990年)，卷一二〈書籍之厄〉，頁四下至五下。
- 8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四九〈王溥傳〉，頁8801-2。
- 9 《齊東野語》，卷一二〈書籍之厄〉，頁五上。
- 10 《宋史》，卷二九一〈宋敏求傳〉，頁9732-37。
- 11 程俱：〈宋故朝奉郎賀公〔鑄〕墓誌銘〉，載賀鑄：《慶湖遺老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附錄，頁一下至四上(總頁293-95)。
- 12 李新：《跨龍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八〈劉氏藏書序〉，頁一二上至一三上(總頁544-45)。
- 13 周必大：《文忠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三〈張君廷傑墓誌銘〉，頁四上至七上(總頁363-64)。
- 14 李俊甫：《莆陽比事》，《宛委別藏》本，卷六，頁一六上。
- 15 王梓材、馮雲濠(輯)、張壽鏞(校補)：《宋元學案補遺》(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別附卷二〈陳先生宗說〉，頁七二上。
- 16 陸心源(輯)：《宋史翼》(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三五〈徐欽傳〉，頁七下(總頁1512)。
- 17 韓琦：〈張公〔詠〕神道碑銘〉，載張詠：《乖崖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附錄，頁一六下(總頁660)。
- 18 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年。

舉魏晉到隋唐藏書家的總和(共九十位)還多。而潘氏漏收的尚不少,如上面提到的東都劉氏、吳郡張廷傑、茶陵陳宗說、豐城徐欽及濮州(治今山東鄆城北)張詠;四川漏收的就更多了,詳見後述。

宋代民間藏書之風盛行,與士人從事舉業和鑽研學術、需要閱讀大量書籍有關,而雕版印刷業的發達,為收藏大量圖書創造了條件。故魏了翁云:「自唐末五季以來,始為印書,極於近世,而閩、浙、庸、蜀之鋟梓遍天下。」<sup>19</sup> 浙為浙之異體,庸指河南。<sup>20</sup> 福建的建安、浙江的杭州、河南的開封和四川的成都為宋代四大雕版印刷中心。

除印刷術的發展之外,其他如宋朝政府的「右文」國策、社會的尚文之風、經濟的高度發展等等,都有助於宋代民間藏書之風盛行。

### 宋代四川民間藏書概況

宋代四川印書、藏書之盛承襲自唐末五代。《舊五代史》卷四三〈明宗紀〉長興三年(932)二月注曰:

《愛日齋叢鈔》云:……〔《通鑑》〕又曰: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板刻《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王仲言〔明清〕《揮塵錄》云: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案〔唐柳玭〕《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883〕夏,鑾輿〔按:指唐僖宗〕在蜀之三年也,余〔柳玭〕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大概唐末漸有印書,特未盛行,後人遂以為始於蜀也。<sup>21</sup>

雕板印刷始於何時何地,眾說紛紜,但蜀為雕板印刷最早昌行地區之一,則是沒有異議的。早自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劍南兩川已有印版日曆售賣。唐懿宗咸通六年(865),日本僧人宗叡從中國攜帶回國的書籍中,有西川所印的《唐韻》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三十卷。清光緒廿六年(1907),英國人斯坦因從敦煌一秘室中

<sup>19</sup> 《鶴山集》,卷四一〈眉山孫氏書樓記〉,頁353。

<sup>20</sup> 庸為西周封國名,又作鄘,在今河南新鄉西南。另有商之侯國名庸,曾隨周武王伐紂,建都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春秋時為楚所滅。

<sup>21</sup>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588-89。

獲得一批古印本書籍，並運往倫敦大英博物館，其中有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曆」殘本，是世界最古的印本曆書之一。1944年在成都四川大學校區內，從一座唐墓中發掘出一張印本陀羅尼經咒，上有「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的題記，據稱是中國大陸僅存最古的唐代刻本。<sup>22</sup>

陳樂素〈宋代三館考〉云：

自經安、史、黃巢之亂，長安文化移植於蜀，爰及五代，遂呈異彩。《五代史·前蜀世家》：「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善待士，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建倡此風，影響於文化甚大，故前後蜀不過五十餘年，而文學、美術與工藝上之印刷術皆有相當之貢獻。人既移於蜀，物亦必隨之，有唐之書，入於蜀府者恐不尠。<sup>23</sup>

筆者所見兩條宋代史料，可以印證陳氏的推斷。宋初黃休復《益州名畫錄》卷上「趙德玄」條云：「蜀因二帝駐蹕，昭宗遷幸，自京入蜀者，將到圖書名畫，散落人間，固亦多矣。杜天師在蜀，集道經三千卷，儒書八千卷。〔趙〕德玄將到梁隋及唐百本畫，或自摹搨，或是粉本，或是墨跡，無非秘府散逸者，本相傳在蜀，信後學之幸也。」<sup>24</sup> 鄧椿《畫繼》序文亦云：「予雖生承平時，自少歸蜀，見故家名勝避難於蜀者十五六，古軸舊圖，不期而聚。而又先世所藏，殊尤絕異之品，散在一門，往往得免焚劫。」<sup>25</sup> 於此可知陳氏之估計不誤。唐末五代四川藏書之盛，與避亂的長安人士攜書入蜀和四川的雕版印刷發達這兩大因素密切相關。<sup>26</sup>

前引《舊五代史》注所提到的孟蜀時宰相毋昭裔，本身就性好藏書，在成都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鏤版，行於世。入宋後其子毋守素齋至中朝，諸書遂大彰於世。<sup>27</sup> 除毋昭裔以外，前蜀宰相王鏊亦藏書數千

<sup>22</sup> 參見T. F. Carter (原著)、L. C. Goodrich (修訂)、胡志偉 (譯注)：《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46-55；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二雕板的發明」，頁27-69；吳天墀：〈宋代四川藏書考述〉。

<sup>23</sup> 《圖書季刊》第3卷第3期(1936年9月)，頁115。

<sup>24</sup>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一三下(總頁487)。

<sup>25</sup>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一上至一下(總頁504)。鄧椿為北宋執政鄧洵武之孫，南宋雙流人。

<sup>26</sup> 自唐代安史之亂以來，每當北方動亂，都有大批官僚士人之家避亂入蜀。參見鄒重華：〈唐僖宗時遷蜀士族及其入宋後的境況考析〉，載張其凡、陸勇強(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58-82；及〈士族與學術——宋代四川學術文化發達原因探討〉(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1998年)，第二章。

<sup>27</sup> 《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傳〉，頁13893-94；吳任臣：《十國春秋》，《四庫全書珍本三集》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卷五二〈毋昭裔傳〉，頁二下至三下。

卷，一一皆親札，並手寫藏經。<sup>28</sup>著名的眉山孫氏藏書樓則始建於唐末（詳見後述）。唐末五代，蜀中積聚了大量的圖書。《冊府元龜》記：後唐天成二年（927）十二月，「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三川孟知祥處，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傳千餘卷，並付史館。同光〔後唐莊宗年號，923-926〕已後，館中煨燼無幾，《九朝實錄》甚濟其闕」。<sup>29</sup>至宋初，「〔曹〕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銖金寸錦之附」。<sup>30</sup>乾德四年（966）五月，太祖遣右拾遺孫逢吉往蜀中取圖書、法物，得蜀書萬三千卷（一說二萬三千卷）。<sup>31</sup>連同前述宋太祖將平吳、蜀所得文史書籍副本分贈大臣，王溥藏書因而大增之史實，都可證明蜀地藏書之豐盛。<sup>32</sup>

承襲唐末五代遺風，宋代四川民間藏書之風鼎盛，藏書上萬卷者不乏其人。

成都新繁人彭乘（985-1049），不喜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刊校。考中進士，為仁宗朝翰林學士。彭乘曾「預校正《南北史》、《隋書》」，有《彭秘書文集》。<sup>33</sup>北宋中後期成都布衣楊匯積書萬卷，古金石刻則超過北宋大學者歐陽修的《集古錄》。<sup>34</sup>成都廣都郭叔誼（1155-1233）築室藏萬卷書，皆手自校讎。著有《續通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溫公通鑑評》三卷，以及《理學語類》三十卷、《肖舟詩稿》二十卷、雜著八十卷等理學、文學著作。<sup>35</sup>

彭州人穆深之（1106-1174）藏書萬卷，博學喜讀書，好議論性理，通貫二

<sup>28</sup> 焦竑：《焦氏筆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續集卷四〈藏書〉，頁224。《宋代藏書家考》首錄五代入宋藏書家為四川陵州貴平（今四川簡陽西南鎮金）人孫光憲。據《宋史》卷四八三〈孫光憲傳〉，光憲博通經史，尤勤學，聚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讎校，老而不廢（頁13956）。但孫光憲早依荊南高季興為從事，後歸宋太祖，其書並未藏於四川。

<sup>29</sup>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五七，頁四下（總頁656）。

<sup>30</sup> 王君玉：《國老談苑》，《學津討原》本，卷一，頁五下至六上。

<sup>31</sup> 參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1995年），卷七，頁171；陳樂素：〈宋代三館考〉，頁115。

<sup>32</sup> 關於五代蜀中刻書、藏書之情況，可參見戴振輝：〈五代的刻書與藏書〉，原刊《大公報》，1936年6月4日，「圖書副刊」第133期；轉引自李希沁、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90-95。

<sup>33</sup> 《宋史》，卷二九八〈彭乘傳〉，頁9899-9900；許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成都：巴蜀書社，1986年），頁31。以下有關宋代蜀籍學者著述及其存佚情況，凡未特別注明者，均參見《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宋史》本傳作華陽，據南宋人（撰）、費著（修訂）、謝元魯（點校）：《氏族譜》（收入《巴蜀叢書》第一輯〔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彭氏實為新繁人（頁282-83）。

<sup>34</sup> 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二二，頁173。

<sup>35</sup> 《鶴山集》，卷八三〈知巴州郭君（叔誼）墓誌銘〉，頁691-92。

氏。<sup>36</sup> 同為彭州人，且與穆深之同時的趙樗年(1106–1160)，家藏千卷書，自丹鉛鉤提，至老不倦。<sup>37</sup> 綿州李仲侯(1063–1141)喜讀書，藏書萬卷。著有《詩集》十卷、《歸田唱和集》十卷。<sup>38</sup>

綿州鹽泉蘇易簡九世孫，徙居遂州遂寧的蘇振文(?–1233)，聚書數萬卷，聖經賢傳、山經地志、私乘野史，以至虞初稗官旁行數落之書，靡不搜羅。<sup>39</sup> 蘇振文曾應眉山人知合州任逢之請，參與《合州墊江志》的修纂，「大肆力於諸書，旁搜曲取，晨夕從事」。<sup>40</sup> 蘇振文本來就擅長讖經訂史，訓詁校讎，其豐富的藏書，更可派上用場了。

眉州丹稜人史大年(1026–1090)屢舉進士不第，乃歸教其子，於所居室為層屋，號曰「五經樓」，藏書萬卷。史大年次子厚登神宗元豐元年(1078)進士第，幼子愿登哲宗元祐三年(1080)進士第，其長子窠為鄉貢進士。<sup>41</sup> 大年從姪史九齡(字南壽，1043–1117)亦「性嗜書，多所藏」。<sup>42</sup>

嘉州犍為有王氏書樓，亦藏書萬卷。蘇軾有詩詠之云：「樹林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濱；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sup>43</sup> 蘇軾與犍為王齊愈、王齊萬兄弟為友，<sup>44</sup> 或即書樓王氏。眉山人家彬為前述眉州丹稜藏書家史大年之妻所撰墓銘云：「夫人姓王氏，犍為郡先生君淳之女也，為郡著姓，其居清水之溪，故遂以所居顯，號清水溪王氏。」<sup>45</sup> 亦可能是書樓王氏族人。

<sup>36</sup> 李石：《方舟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六〈穆承奉〔深之〕墓誌銘〉，頁二二上至二四上(總頁718–19)。

<sup>37</sup> 同上注，〈忠州文學趙君〔樗年〕墓誌銘〉，頁二四下至二五下(總頁719–20)。

<sup>38</sup> 李安仁：〈李仲侯墓誌銘〉，載劉喜海(編)：《金石苑》(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第五冊，卷四，頁四下至五上(總頁245–46)；又載傅增湘(篆輯)：《宋代蜀文輯存》(香港：龍門書店影印，1971年)，卷三三，頁六上至七下(總頁442–43)。兩處的文字內容多少不同，可參校。

<sup>39</sup> 《鶴山集》，卷八四〈蘇伯起〔振文〕墓誌銘〉，頁702–3。

<sup>40</sup> 任逢：〈合州墊江志序〉，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三，頁六下(總頁928)。

<sup>41</sup> 家彬：〈史子永〔大年〕墓誌銘〉，載劉良模等(修)、羅春霖等(纂)：《民國丹稜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卷二，頁三二上至三四上(總頁654–55)。其墓石拓片載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匯編(兩宋部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0冊，頁61。

<sup>42</sup> 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四部叢刊三編》本，卷一〇〈史南壽〔九齡〕墓銘〉，頁八下。史九齡之祖父正辭與大年之父定辭為兄弟。

<sup>43</sup> 蘇軾(撰)、王十朋(注)：《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宋刊本，卷九〈犍為王氏書樓〉，頁187。

<sup>44</sup> 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六三〈祭任師中〔伋〕〉，頁1944。

<sup>45</sup> 《民國丹稜縣志》，卷二〈太原郡夫人王氏墓誌銘〉，頁三三上(總頁654)。

一些官員嗜好藏書，俸入多用作購藏書籍。

簡州陽安劉諷喜藏書，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四四〈人物志二〉引司馬光《續詩話》云：「嘉祐中有劉諷都官，簡州人，年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山。景仁〔范鎮〕有詩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幾惟知白日長。』時有朱公綽送諷詩云：『疏草焚來應見史，囊金散盡只留書。』皆為時人所傳誦。」劉諷為南宋著名學者劉光祖的高祖，負時名，宋祁、蘇渙有詩贈之。<sup>46</sup>簡州劉氏為宋代四川著名的宦學世家。

閬州陳堯咨從孫陳漢卿（1009–1054）尤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嘗自為目錄，藏於家。<sup>47</sup>

邛州依政趙薦（1034–1081）歷官綿州、號縣、西河、彰武軍、榮州等川內外之地，俸祿之入，往往歸諸書畫。有詩集十八卷，四千三百首。<sup>48</sup>

丹稜孫道夫（1095–1160）「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孫道夫除在徽宗、高宗時短期任朝官外，大多在四川任地方官，先後知懷安軍、資州、蜀州，最後從知綿州任上退休。故可斷定其書藏於蜀。<sup>49</sup>

漢州綿竹章得茂，為南宋光宗時（1190–1194）吏部尚書，於其綿竹故居「復創大堂於兩間，藏書數千卷，榜曰『近思』」，並請曾同為朝官的周必大為之作記。周必大稱讚章得茂「學無不通，而尤深于《詩》」。<sup>50</sup>

普州人劉儀鳳（字韶美，1110–1175）以俸入之半以儲書，凡萬餘卷，致因此而丟官。御史張之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後孝宗知其無罪，始復職。<sup>51</sup>同為蜀人的著作佐郎關耆孫，有送劉儀鳳歸蜀詩云：「清議久不作，世無公是非。祇因翻故紙，不覺蹈危機。東壁夢初斷，西山蕨正肥。十年成底事，贏得載書歸。」<sup>52</sup>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記：「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為一部者亦然。出局則杜門校讎，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新灘，一舟為灘石所敗，餘二舟無他，

<sup>46</sup> 王象之：《輿地紀勝》，《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一四五〈簡州·人物〉「劉昊」、「劉諷」，頁215。

<sup>47</sup> 《歐陽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元刊本，卷三〇〈陳君〔漢卿〕墓誌銘〉，頁338–39。陳漢卿以蔭入仕。

<sup>48</sup> 呂陶：《淨德集》，《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卷二四〈都官員外郎趙君〔薦〕墓誌銘〉，頁一上至三下。

<sup>49</sup> 《宋史》，卷三八二〈孫道夫傳〉，頁11765–67。

<sup>50</sup> 《文忠集》，卷二八〈章氏近思堂記〉，頁二二上至二二三下（總頁311）。該文中又記「得茂」為「德茂」。

<sup>51</sup> 《宋史》，卷三八九〈劉儀鳳傳〉，頁11940–41。

<sup>52</sup> 鳳鸞（輯）：《宋詩紀事》（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卷四六〈送劉朝美〔韶〕侍郎歸蜀〉，頁四上（總頁2271）。



遂以歸普慈〔鎮，今樂至東北〕，築閣貯之。」<sup>53</sup> 劉儀鳳不僅好藏書，亦苦學，至老不倦，尤工於詩。有《劉韶美詩》、《奇堂集》三十卷。<sup>54</sup>

宋代私學教育發達，民間有許多從事私學教育的鄉先生（私學教師），<sup>55</sup> 有的鄉先生也藏書不菲。

北宋中期成都鄉先生（私學教師）郭絳，幼讀父書，盡傳其學，亦是一位藏書家。平生惟好書，無他嗜，丹鉛點勘，筆不去手，白經史百氏之書，浮屠黃老之教，下暨陰陽地理醫卜之藝，吐納鍛煉之術，皆研盡其妙。郭絳有《易解》十卷、《書解》七卷、《老子道德經解》二卷、《三教合轍論》一卷、《疏食譜》一卷、歌詩雜文十卷等著作多種。<sup>56</sup>

曾教過魏了翁的邛州蒲江鄉先生章寅臣（1156–1225），「嗜儲書，雖家貧，必畜經史」。<sup>57</sup>

四川民間藏書豐富，以致兩宋時期，朝廷都從該地的民間藏書家中徵集書籍，以補朝廷收藏之闕。

成都郫縣人李定，好古力學，自號「虛舟子」。北宋真宗天禧（1017–1021）中，詔訪天下書籍，「定率先投牒監中，群書多出其家」。<sup>58</sup>

成都郭友直（1008–1071）喜藏書，至萬餘卷，謄寫校對，盡為佳本。北宋英宗治平（1064–1067）中詔求遺書，郭友直所上凡千餘卷，盡為秘府之未有者。<sup>59</sup>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七四〈經籍考〉載：「〔熙寧〕七年〔1074〕，命三館祕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祕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為將作監主簿。」<sup>60</sup> 於此可見，郭友直的藏書既多且好。郭友直著有《劍南廣記》四十卷、《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沿革樂書》十三卷。

<sup>53</sup> 《學津討原》本，頁五上至五下。

<sup>54</sup> 《宋史》，卷三八九〈劉儀鳳傳〉，頁11940–41。

<sup>55</sup> 參閱鄒重華：〈「鄉先生」——一個被忽略的宋代私學教育角色〉，《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八期（1999年），頁139–62。

<sup>56</sup> 楊天惠：〈樂善郭先生誄〉，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二六，頁二二下至二四上（總頁370–71）；《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廬陵學案補遺·孝子郭樂善先生絳〉，頁一二二上至一二三下。《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未收郭絳。

<sup>57</sup> 《鶴山集》，卷八二〈雒縣丞章公〔寅臣〕墓誌銘〉，頁687。

<sup>58</sup> 曹學佺：《蜀中廣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九八「虛舟子集」，頁一三下（總頁582）。

<sup>59</sup> 文同：《丹淵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明刊本，卷三九〈龍州助教郭君〔友直〕墓誌銘〉，頁290–91。

<sup>60</sup> 《文獻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1509中。馬端臨記郭友直為進士，據文同所撰墓誌銘，郭友直「景祐中被薦試尚書省，不第，遂歸，不復就舉。……熙寧四年四月，朝廷以伯龍〔郭友直字〕景祐進士恩授將仕郎守龍州助教」。又《文獻通考》卷〔下轉頁42〕

宇文氏為宋代四川詩書名族。<sup>61</sup> 宇文師申(1111-1162)「治室廬，陳圖書」。<sup>62</sup>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

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亡闕，始詔館職讎校。曾鞏等以秘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1144〕，并憲孟〔度〕為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闕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sup>63</sup>

宇文時中(字季蒙)為師申之父，清人葉昌熾《藏書紀事詩》<sup>64</sup> 卷一收有宇文時中及其兄虛中二人。宇文時中從孫宇文紹奕亦是藏書家，張震撰《博雅堂記》云：「宇文紹奕為資守，風清事簡，則嘆曰：『自吾承先大父右丞相公餘烈，以詩書發身，凡二十年間，聚書上自孔氏，下至歷代諸史稗官小說，與夫國典名公之文，合萬餘卷，手所校錄者幾半之，不為不多矣。』」<sup>65</sup> 由此可見，宇文氏是富有藏書傳統的家族。

除上述藏書家外，其他喜藏書者尚多。如瀘州人程賁少孤力學，性喜藏書，「自經史子集之外，凡奇訣要錄未嘗聞於人者，畢珍收之，亦多手寫焉。……雖年

〔上接頁41〕

一七四《經籍考》記，徽宗宣和五年(1123)二月，「提舉祕書省言：『有司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一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褒賞。』詔頤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頁1509下至1510上)。張、李二人的生平情況不詳。

<sup>61</sup> 參見王德毅：〈宋代成都宇文氏族系考〉，《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16期(1991年)，頁81-89。

<sup>62</sup> 晁公遯：《嵩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三〈宇文蜀州〔師申〕墓誌銘〉，頁三上(總頁292)。

<sup>63</sup> 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五「宋書」條，頁184。又卷六「呂夏卿兵志」條云：「公武得之於宇文時中。」(頁261)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稱宇文季蒙字時中(頁135)，實則季蒙為其字，時中為其名。

<sup>64</sup> 葉昌熾(著)、王欣夫(補正)、徐鵬(輯)：《藏書紀事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48-51。

<sup>65</sup> 劉炯等：《光緒資州直隸州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卷二九，頁一三上(總頁932)。

齒已暮，而志好益堅。目遊簡編，未少暫息」。<sup>66</sup> 程賁藏書校書達五十多年，撰寫《太玄經訓義》，未成而卒。遂州遂寧人馮玠(1035-1070)喜儲書，好賓客。<sup>67</sup> 普州安岳楊恕(1037-1097)於書無所不讀，聞人間所未見書，必購取之。為童兒時，日誦千言，稍長，酷愛《左氏春秋》，能背誦之。鄉先生王田「砥礪名節，以教鄉閭之子弟，來學者必考其素。至君來，欣然受之曰：『此諸生之表也。』」<sup>68</sup>

宋人葉夢得云：「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sup>69</sup> 這一說法為人們所普遍引用。而在北京圖書館工作達四十年的印刷史和古籍版本專家張秀民卻認為：「蜀中所刻，宋人稱為『蜀本』或『川本』，質量可與『杭本』比美。」又云：「蜀大字本在當時已稱為善本，因為蜀本內容多經加校正，如成都刻的《太平御覽》改正了建本的錯誤字三萬八千多個。四川從唐以來就出好紙，名為『益州麻紙』，或『蜀郡麻紙』，南宋川筆、川墨，被稱為『絕品』。因為紙墨精良，所以它的出版品，也獲得好評，宋人把它與杭本比美不是偶然的。」<sup>70</sup>

蜀中印書業興盛，蜀版書量大質好，吸引不少宦遊蜀中的文人官員收藏蜀版書籍。北宋神宗時，歷陽(今安徽和縣)人、天聖進士沈立任簽書益州判官，「悉以公粟售書，積卷數萬。神宗問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sup>71</sup> 沈立還著有《鹽筴總類》、《賢牧傳稽正辨訛》、《香譜》、《錦譜》、文集等四百卷，可謂是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南宋初，天性好書的河南南陽人井度(字憲孟)，自知興元府至領四川轉運使。前文曾提到，井度向蜀中藏書家宇文氏等徵集朝廷秘閣所闕的南北朝七史。而他

<sup>66</sup> 黃休復：《茅亭客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〇〈程先生〉，頁五上(總頁962)。《宋史》卷三〇九〈程德玄傳〉(頁10155-56)附記其兄德元之子程賁，大中祥符五年(1012)舉進士，累遷太常博士。程德玄為鄭州滎澤人。黃休復借《易經》稱譽程賁：「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四庫全書總目》《茅亭客話》提要稱：「皆蜀中軼事，無一條旁涉他郡。」故兩個程賁當為同名。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將黃休復所記程賁與鄭州人程賁混為一人(頁65)，誤。

<sup>67</sup> 《跨龍集》，卷二九〈馮君貺〔玠〕墓表銘〉，頁四下至六上(總頁640-41)。

<sup>68</sup>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宋刊本，卷二三〈楊寬之〔恕〕墓誌銘〉，頁260。

<sup>69</sup> 葉夢得：《石林燕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頁六下(總頁605)。鄭偉章、李萬健著《中國著名藏書家傳略》(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之〈圖書收藏家和研究家葉夢得〉誤為「杭州刊刻質量最好，福建次之，四川最差」(頁7-8)。

<sup>70</sup> 張秀民：〈南宋(1127-1279)刻書地域考〉，《圖書館》1961年第3期，頁55；〈歷代精美的印刷品〉，載《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年)，頁60。

<sup>71</sup> 《宋史》，卷三三三〈沈立傳〉，頁10698-99；楊傑：《無為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二〈沈公〔立〕神道碑〉，頁八上至一二下(總頁749-51)。

本人也竭力收藏書籍，「常以俸之半傳錄。時巴蜀獨不被兵，人間多有異本，聞之未嘗不力求，必得而後已。歷二十年，所有甚富」。<sup>72</sup>

山東鉅野晁氏為宋代藏書名家，晁公武於靖康末隨父避難入蜀，紹興中登進士第，曾任四川轉運使井度的屬官。後井度將其所藏書悉與公武，凡五十篋。公武合其家舊藏，除其重複者，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有奇。晁公武守榮州（治今四川榮縣）時，公務不繁，乃日夕讎校，每終篇輒撮其大旨論之，撰成著名的目錄學著作《郡齋讀書志》。<sup>73</sup>

南宋名詩人陸游之家族為越中三大藏書家之一（另兩家為石氏、諸葛氏），《〔嘉泰〕會稽志》卷一六〈藏書〉云：「陸氏書特全於放翁家，〔游〕嘗宦兩川，出峽不載一物，盡買蜀書以歸，其編目日益鉅。」<sup>74</sup>蜀版書籍大大豐富了陸游家族的藏書。

### 民間藏書與地方文化之發展

教育離不開書籍。宋代科舉發達，讀書求仕的人多，雕版印刷術的廣泛應用，滿足了人們對書籍的需求，為普及教育創造了條件。宋代民間藏書家多的原因之一，就是教育子女，求取功名。

如前面提到的眉州丹稜人史大年，就因屢舉進士不第，乃歸教其子，並建立藏書萬卷的五經樓。結果史大年次子、幼子相繼考中進士。

淳化中王李之變，郡邑大擾，蜀州閬太古盡棄家財，挈家中所有書籍，「居二江野外奧曲，賊不能到處，穴地藏之。曰：『貨財吾不屑，此書如為兵火蹂躪，後求無有也。』」事平出之，使子弟日夜講解誦習，要之為名儒。其子閬中丞天聖八年（1030）進士。<sup>75</sup>文同為閬太古表弟羅致恭所撰墓誌銘云，賊誅，太古收斂其所藏書，與羅致恭日夜講讀，太古授以《左氏春秋》，盡通其學。致恭復以所能，勉勵太古之子頤。

永康軍青城何中「以聚書為能」，與蜀中名士李旼、代淵為友，其孫何大章登仁宗皇祐五年（1053）進士第。<sup>76</sup>嘉州洪雅田錫（940—1003）之父好術數，聚書數千卷。田錫幼好讀書，慕揚雄、司馬相如為文，其父寄予厚望。後田錫中太平興國三年（978）進士第二。<sup>77</sup>

<sup>72</sup> 《郡齋讀書志校證》，〈衢本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序〉，頁15。

<sup>73</sup> 同上注。

<sup>74</sup> 施宿等：《〔嘉泰〕會稽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三〇上（總頁358）。

<sup>75</sup> 《丹淵集》，卷三六〈屯田郎中閬君〔頤〕墓誌銘〉，頁266。閬頤及其父太古之名見《丹淵集》卷三七〈屯田員外郎羅君〔致恭〕墓誌銘〉，頁271—73。

<sup>76</sup> 《淨德集》，卷二五〈何君〔旼〕墓誌銘〉，頁九上至一〇上。

<sup>77</sup> 田錫：《咸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〇〈附先君贈工部郎中墓碣〉，頁八上至一一上（總頁563—64）；卷首附范仲淹：〈田司徒墓誌銘〉，頁一上至五上（總頁355—57）。

閩州新井蒲宗孟家有藏書樓名「清風閣」。蒲宗孟中仁宗皇祐五年進士，神宗朝曾任翰林學士兼侍讀，與蘇軾等有交往。<sup>78</sup>蘇軾〈寄題蒲傳正學士閩中藏書閣〉詩云：「朱欄碧瓦照山隈，竹簡牙籤次第開。讀破文章隨意得，學成富貴逼身來。詩書教子真田宅，金玉傳家定糞灰。更把遺編觀得失，君家舊物豈須猜。」<sup>79</sup>北宋著名蜀籍史學家范祖禹曾借閱過蒲氏藏書，亦有詩云：「惟昔隱君子，卜築茲考槃。圖書侔藏室，一一手自刊。……來為廊廟重，歸為里閭歡。乃知哲人訓，基構自艱難。我昔侍先君，借書嘗縱觀。題詩尚可記，手澤想未乾。爾來三十載，感事一汎瀾。側身西南望，安得陵風翰。」<sup>80</sup>蒲氏藏書是有傳統的。蒲宗孟之曾祖父蒲穎士「善藏書」，祖父蒲伸三以鄉薦，退於春官，自號「北谷散夫」。蒲伸子蒲師道（宗孟父，1008–1053）「承父詞，又得所蓄書以讀」，中仁宗天聖八年進士乙科。<sup>81</sup>《道光南部縣志》卷二〈輿地·古蹟〉記：「清風閣，□□□蒲宗孟積書之所，有銘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sup>82</sup>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戒條，蒲氏的藏書得以傳承不散。蒲宗孟之姊受家風影響，「亦喜讀書」。後蒲宗孟之姊嫁給蘇渙之子蘇不欺，不欺早逝，蒲氏訓教諸子，五子中千能、千秋、千鈞皆舉進士。<sup>83</sup>

川東恭州（今重慶市）人張獻忠（1106–1157）嘗從其叔父元明學易，入三舍為諸生。舍法罷，退居家中，「立家塾，聚詩書，教其子」，四子皆應進士舉。<sup>84</sup>

南宋著名學者和藏書家、邛州臨邛人魏了翁的鄰居譙氏以儒名家，譙椿（1143–1213）之父譙詢曾兩貢於禮部，未第而亡，所藏圖籍散逸殆盡。譙椿雅嗜書，多所儲蓄，自六經子史至星經地乘、虞初稗官、道釋暨卜之書，靡不究閱。譙椿子譙仲午（1167–1225）自少惟文籍圖書是好，其父築室儲書，「君從師至休沐，必補葺斷爛，校讎脫誤，忘其日之吁」。譙仲午登嘉定四年（1211）進士第。譙仲午沈潛經史，有《孟子旨義》、《漢書補注》、《三國名臣統論》、《說齋文集》等。<sup>85</sup>

<sup>78</sup> 《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傳〉，頁10570–72。

<sup>79</sup> 蘇軾：《樂城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明活字印本，卷五，頁89。

<sup>80</sup> 范祖禹：《范太史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寄題蒲氏清風閣〉，頁七下至八上（總頁99–100）。

<sup>81</sup> 蔡襄：《端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九〈蒲君〔師道〕墓誌銘〉，頁一七上至一七下（總頁678）。

<sup>82</sup> 王瑞慶等（修纂）：《道光南部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頁三一上（總頁393）。

<sup>83</sup> 《淨德集》，卷二七〈靜安縣君蒲氏墓誌銘〉，頁八下至一〇上。

<sup>84</sup> 馮時行：《縉雲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張廷臣〔獻忠〕墓誌銘〉，頁二上至三下（總頁880）。

<sup>85</sup> 《鶴山集》，卷七〇〈譙府君春〔椿〕墓誌〉，頁569；卷七六〈譙君〔仲午〕墓誌銘〉，頁628–30，引文見頁629。

南宋前期普州人馮知微喜藏書，積至萬卷，四庫之目甚富，有一錢即惟書之市。曰：「有一不惜，蠹淫吾書，非儒門子也。」馮氏世為普州閩家，父子兄弟以詩書相韻頡，雖甚貧，不破業，雖至老，不廢學，其為名卿才大夫者踵武，以至代有人才。馮知微雖累薦不利，長子馮懋登進士第，幼子馮恕為成都府學學生。<sup>86</sup>

資中人李處和自少傳其家學，為諸生，年三十餘未達，且甚貧。乃出遊，而其平生故人親戚稍資業之。因賈於荊襄巴蜀之間，不十年而其利百倍。既富，則慨然曰：「是故吾之權道，豈其初心哉。」於是停掉生意，定居於涪之樂溫（治今四川長壽東北），葺齋館，益市六經百家歷代史傳，闔門不出，日以讀書教子為事。<sup>87</sup>

北宋蜀州人李平善治家，不為米鹽斗筲之計，而田至數頃，貲數萬。諸弟欲析其產，君一毫不忍私，罄所有與之。自是不復營產，惟聚書延賢師友以教子。或告之宜少蓄藏，留些資財與後裔。李平對曰：「吾子苟力學，他日能大吾門，其得失豈潤屋比耶？」李平夫人畢氏常閱書善誨，諸子往往執經問其大旨。李氏四世不仕，李平用於藏書之投資，終因長子逢登嘉祐二年（1057）進士第，得到了滿意的回報。<sup>88</sup>

眉山程氏始以進士起家，歷六世，仕者日以加多，其鄉人不解程氏何以能如此。晁公遯撰〈程氏經史闡記〉解釋說：「其家既貴，而不以殖其貨，而能築閣於其所居，以聚四庫書，而貽其子孫。」<sup>89</sup>即強調了藏書、讀書是程氏興盛的重要原因。

藏書與教育和科舉之關係，由以上四川藏書之家的介紹中已可略知一二。這些家族大多科舉頗盛，如成都毋氏、句氏、郭氏、宇文氏、廣都郭氏、眉州眉山石氏、孫氏、程氏、丹稜史氏、李氏、青神楊氏、彭山師氏、蜀州閻氏、邛州蒲江魏高氏、隆州井研李氏、閬州陳氏、資州趙氏等，有的家族興盛於一時，有的綿延數世。<sup>90</sup>

藏書與學術之關係亦密不可分。前述四川藏書家大都鑽研學術，多有著述。前文對此已略有提及，茲再撮要加以論之。宋代四川的學術以文史最著稱，宋代四川的諸多大師和名學者，同時也是著名藏書家。

文學方面，首推位列唐宋八大家的三蘇父子。眉州本為藏書鼎盛之區，眉山蘇

<sup>86</sup> 《方舟集》，卷一五〈馮主簿〔知微〕墓誌銘〉，頁二二上至二三下（總頁705）。

<sup>87</sup> 馮時行：〈稽古堂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六，頁八上至八下（總頁601）。

<sup>88</sup> 《淨德集》，卷二六〈隴西李君〔平〕墓誌銘〉，頁五下至七上；卷二五〈著作佐朗李府君〔逢〕墓誌銘〉，頁一上至三上。

<sup>89</sup> 《嵩山集》，卷四九，頁八上（總頁275）。

<sup>90</sup> 參見鄒重華：〈士族與學術〉，第三章。

氏至蘇洵，亦積累起不少書籍。蘇轍撰〈藏書室記〉云：「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廬，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sup>91</sup>蘇氏家學傳承綿延不絕，貫穿兩宋，家族治學的人多，故入《宋元學案》者五世多達十七人。<sup>92</sup>

眉州彭山師民瞻自幼嗜學，至老不倦。登政和八年(1118)進士第，仕四十年，田宅不長尺寸，自成都罷官，以俸餘市書數千卷以歸。師民瞻撰《杜蘇詩註》，魏了翁幼時讀此書，「於師氏注釋明辯閎博，心竊好之」。<sup>93</sup>

資州趙逵(1117-1157)平生無他好，獨喜收聚古書，考歷代治亂興衰之跡，而權其至要。為文根據，亦以古為歸。<sup>94</sup>趙逵中紹興二十一年(1151)進士第一，高宗謂趙逵文章似蘇軾，稱為小東坡。有《棲雲集》三十卷(佚)。<sup>95</sup>今存《趙逵文粹》。

前述富有藏書傳統的宇文氏家族，宇文虛中與其兄粹中「俱以文學論議被遇圖陵〔徽宗〕，極翰墨之選，燁然一時」。<sup>96</sup>虛中後使金而留金廷，金人號為「國師」。<sup>97</sup>宇文紹奕著有《臨邛志》二十卷、《補遺》十卷，以及《原隸》、《石林燕語考異》十卷等。

眉州丹稜藏書家孫道夫以文才知名，宋高宗諭宰相曰：「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為詞臣。」<sup>98</sup>今《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四收有其文八篇。

史學方面，李燾、李心傳為宋代最著名的史學家之一，各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聞名於世，人稱「三李」。眉州丹稜李燾(1115-1184)藏書數萬卷，所至求奧篇隱佚，傳錄讎校，雖陰陽卜說，亦無遺者。<sup>99</sup>周密在《齊東野語》卷一二〈書籍之厄〉中云：「至如秀岳、東窗、鳳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

<sup>91</sup> 《樂城集》三集，卷一〇，頁721。

<sup>92</sup> 參見鄒重華：〈士族與學術〉，第三章第一節。

<sup>93</sup> 《鶴山集》，卷八七〈師君〔民瞻〕墓誌銘〉，頁721。

<sup>94</sup> 周麟之：《海陵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三〈中書趙舍人〔逵〕墓誌銘〉，頁二三上至二七上(總頁189-91)。

<sup>95</sup> 同上注；《宋史》，卷三八一〈趙逵傳〉，頁11751-53。

<sup>96</sup> 張栻：《南軒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一〈宇文史君〔師獻〕墓表〉，頁一下(總頁756)。

<sup>97</sup> 《宋史》，卷三七一〈宇文虛中傳〉，頁11528。

<sup>98</sup> 同上注，卷三八二〈孫道夫傳〉，頁11766。

<sup>99</sup> 《文忠集》，卷六六〈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頁七下至二三下(總頁700-708)。

人，號為史家，所藏僻書尤多。」秀岳(岩)為隆州井研李心傳之號，東窗為心傳弟李道傳之號，鳳山為道傳弟李性傳之號。<sup>100</sup>高氏當指邛州蒲江高斯得，藏書家魏了翁姪子，牟氏指隆州井研牟子才。三李為史學世家，李心傳奉詔在成都修《四朝會要》，牟子才與高斯得均被聘為李心傳的助手。<sup>101</sup>據周密所言，他們亦都為藏書家。高斯得有《易說》、《書解》、《詩膚說》、《儀禮合抄》、《徽宗長編》、《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孝宗繫年要錄》、《寧宗紀》、《增損刊正杜佑通典》、《恥堂存稿》等經史著作多種；牟子才有《存齋集》、《四朝史稿》、《故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等經史著作。高、牟都是南宋著名蜀籍學者。

閬州蒲宗孟被神宗稱為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著有《省曹寺監事目格子》、《八路敕》、《蒲左丞集》、《清風集》、奏議、《蒲宗孟文粹》及編輯《曾公亮勳德集》等。<sup>102</sup>

經學方面，成都毋氏入蜀祖、後蜀宰相毋昭裔博學有才名，酷好古文，精經術，著有《爾雅音略》三卷。<sup>103</sup>子守素入宋後在開寶(968-975)初作過國子祭酒。<sup>104</sup>毋氏後人毋廷瑞(1219-1270)生於成都，「年十二記六經，已能通大義，作賦早有聲，《春秋》程文冠一郡」。經鄉三貢，始登開慶元年(1259)進士第。曾分教黃州，兼領雪堂、河南兩書院。廷瑞的曾祖及祖父均為進士，其父自誠為太學上舍生。毋廷瑞三子遇辰、逢辰、應辰，亦有中進士者。毋廷瑞亦精經術，有乃祖遺風。宋末名學者謝枋得(1226-1289)與毋廷瑞次子逢辰為摯友，應逢辰之請為其父撰銘，已在宋亡以後，稱其三子「皆以奇才實學為達官當方面者所知」。<sup>105</sup>毋氏家學歷兩宋而連綿不斷，其科宦亦如之。

<sup>100</sup> 牟巖《牟氏陵陽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四〈贈甥李松坡天瑞序〉云：「〔李舜臣〕是生三子，秀岩〔李心傳〕布衣，召對賜第，專領四朝史事，至工部侍郎，著述甚多。東窗〔道傳〕、鳳山〔性傳〕皆登世科。」(頁五上〔總頁122])

<sup>101</sup> 分見《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傳〉(頁12355)及卷四〇九〈高斯得傳〉(頁12322)。潘美月《宋代藏書家考》引周密此段話後云：「南宋藏書家有……李心傳、李奕、東窗李氏、高氏、牟氏(以上三人未詳其名)、周密凡十七人。」(頁5)李奕與李性傳皆號鳳山，但李奕為江南東路安仁人，而周密明言所指乃蜀人，且為李氏三兄弟並列，故鳳山指李性傳無疑。

<sup>102</sup> 《宋史》，卷三二八〈蒲宗孟傳〉，頁10570-72；《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頁199-200。

<sup>103</sup> 《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傳〉，頁13893-94；《十國春秋》，卷五二〈毋昭裔傳〉，頁二下至三下。《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未收毋昭裔。

<sup>104</sup> 《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傳〉。

<sup>105</sup> 謝枋得：《疊山集》，《四部叢刊續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卷八〈平山先生毋制機〔廷瑞〕墓銘〉，頁一上至四下。《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傳〉記：「〔毋守素〕蜀亡入朝，授工部侍郎，籍其蜀中莊產茶園以獻，詔賜錢三百萬以充其直，仍賜第於京城。」(頁13893)但毋氏仍有留居於蜀者，〈平山先生毋制機〔廷瑞〕墓銘〉記毋廷瑞即生於成都。



蜀州閻太古「刻意於學，酣嗜典冊，顛倒熟爛，尤喜《左氏春秋》，最為學者左右采獲持去精義，以下其他師」。閻太古之子閻頤亦為名學者，「西南士人宗師之」。<sup>106</sup>彭州趙樞年尤長於《春秋》，其說破凡例傳注，以尊聖人之經。又精於古律詩，多奇語，至其他文，皆有法，有《趙樞年集》。其子趙恕以《春秋》世傳其學。趙樞年與另一藏書家李石為文字之友。<sup>107</sup>

資州李石(1108-?)為南宋著名經學家和博物學家，任太學博士，執政薦其文似黃庭堅，而秀潤過之。高宗曰：「朕知之，是讀書至夜分者。」<sup>108</sup>李石藏書亦富，《蜀中廣記》云：「李知幾主石室，四方從學之士如雲，其題名者至三千人。他日送其姪浩成都學官詩云：『我集四庫書，琬琰藏洛河；此外有石經，參酌正舛訛。』亦可見當日收藏之盛也。」<sup>109</sup>李石〈自敘〉亦稱「築書臺，作方屋，為方舟」。李石自幼至老，「不一日不讀書，病患寒暑不易，或稍廢，日補之」。故高宗亦聞其勤學之名。<sup>110</sup>著有《方舟易學》、《詩補遺》、《左氏卦例》、《方舟經學》、《世系手記》、《樂善錄》、《司牧安驥集》、《方舟集》、《方舟後集》、《韓柳文評論》、《續博物志》等，大多存世。李石曾主持成都府學「石室」，門生遍及四川內外，是南宋前期四川士人學術交遊圈的核心人物，由他的門生弟子及學侶形成的學術群體，可名之曰「方舟學案」。<sup>111</sup>

青神杜莘老(1107-1164)「好學，雖老不厭，俸祿悉以買書，所畜幾萬卷」。<sup>112</sup>杜莘老有《論語集解》、《顯仁禮儀》、《杜起莘文集》。南宋著名學者劉光祖撰〈杜起莘文集序〉云：「公學術之正，文辭之典，氣節之剛，與王公龜齡〔十朋〕大略相似。……今年又得公經論千餘篇，信乎公之學得於孟子者歟。」<sup>113</sup>

眉州青神楊氏藏書數萬卷，楊虞仲被安丙稱為「蜀中名儒」，其子楊泰之(1169-1230)將家中藏書「手自校讎，年十二三後，臥不設榻者幾十歲，讀書必及諸實踐」。楊泰之著述極豐，計有《克齋集》百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雜著》五卷，類書有《春秋列國事目》十五卷、《公羊穀梁類》五卷、《易類》五卷、《詩

<sup>106</sup> 《丹淵集》，卷三六〈屯田郎中閻君〔頤〕墓誌銘〉，頁266，268。

<sup>107</sup> 《方舟集》，卷一六〈忠州文學趙君〔樞年〕墓誌銘〉，頁二四下至二五下(總頁719-20)。

<sup>108</sup> 同上注，卷一〇〈自敘〉，頁二三上(總頁646)。

<sup>109</sup> 《蜀中廣記》，卷九九，頁一三上至一三下(總頁599)。

<sup>110</sup> 《方舟集》，卷一〇〈自敘〉，頁二三上(總頁646)。

<sup>111</sup> 參見鄒重華：〈士人學術交遊圈：一個學術史研究的另類視角(以宋代四川為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九期(2000年)，頁97-139。《宋元學案》未收李石。

<sup>112</sup> 查籥：〈杜御史莘老行狀〉，載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卷五四，頁九下(總頁636)。杜莘老未入仕以前，因宕渠守石翼以師禮延致，乃自眉徙居恭之江津。莘老入朝，不以家同行，卒後歸葬江津。參見《宋史》，卷三八七〈杜莘老傳〉，頁11892-95。

<sup>113</sup> 《宋代蜀文輯存》，卷七〇，頁一四下(總頁894)。

類》三卷、《詩名物編》十卷、《論孟類》七卷、《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類》七十四卷、《歷代通鑑及本朝長編類》二十五卷、《東漢名物編》三卷、《詩事類》八卷，集諸儒易解為《大易要言》二十卷，「皆手自編綴也」。<sup>114</sup> 楊泰之能完成如此之多的著作，顯然得益於家中豐富的藏書。

成都華陽人句中正(929-1002)喜藏書，家無餘財。句中正為宋初名學者，精於字學，宋太宗素聞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覽之嘉賞，因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太宗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並錄之也。」宋太宗略通字學，故對句中正禮待有加。中正又奉太宗之命，與徐鉉、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凡一百卷。<sup>115</sup>

邛州蒲江魏了翁為晚宋著名理學家，與真德秀齊名，《宋元學案》為其立有〈鶴山學案〉。魏了翁亦為藏書家，其藏書量冠絕一時。寧宗開禧二年(1206)秋，了翁請郡西還，於嘉定三年(1210)在其家鄉邛州蒲江建成鶴山書院。他在〈書鶴山書院始末〉中談及書院之藏書云：「堂之後為閣，家故有書，某又得秘書之副而傳錄焉。與訪尋於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萬卷，以附益而尊閣之。」<sup>116</sup> 這表明魏了翁之私人藏書是極豐富的，了翁雖任官中朝內外，藏書仍留在故鄉。而鶴山書院積書至十萬卷，確實不簡單。故近人班書閣考訂宋代書院藏書情況以後嘆曰：

四大書院〔白鹿、嶽麓、應天、嵩陽〕者，雖知其在宋已皆藏書矣，然未知究皆藏書若干卷。就以上所舉，其時書院之藏書最多者，度已莫過於鶴山。了翁曰：「凡得十萬卷」，以之較《文獻通考·經籍考》(一百七十四)所云之「古書自唐以後甲乙丙丁，分為經史子集四類；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是也」，實已過之而有餘。是國家之藏書，尚不若鶴山之富，其他各書院，豈易與之比擬哉。<sup>117</sup>

鶴山書院乃私人所建，其藏書雖得到公家支援，仍屬民間藏書性質。

蜀中私人藏書不僅有利於藏書者之教育和學術事業，有的亦廣泛惠及他人，藏書家往往讓他人共享其利。

文同為成都郭友直所撰墓誌銘云：「兩蜀士大夫與四方從宦於西南者，於伯龍〔郭友直字〕無有不識。非伯龍之求之也，而其人自以為苟不識伯龍，則為徒至於此矣。蓋伯龍善與人交，又喜藏書，至萬餘卷，謄寫校對，盡為佳本。伯龍無不

<sup>114</sup> 《鶴山集》，卷八一〈大理少卿直寶謨閣楊公〔泰之〕墓誌銘〉，頁672-75，引文見頁675。

<sup>115</sup> 《宋史》，卷四四一〈句中正傳〉，頁13049-50。

<sup>116</sup> 《鶴山集》，卷四一，頁349。

<sup>117</sup> 班書閣：〈書院藏書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3號(1931年5-6月)，頁57。

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人多與之遊，伯龍亦未嘗輒厭見其人。所以善譽聞於天下將五十年。」<sup>118</sup> 郭友直廣與人交，樂於為人解答疑難，實際上與人共享其藏書之利。彭州人穆深之亦廣交四方名輩，人知其為儒者。<sup>119</sup>

《宋史·彭乘傳》云：「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sup>120</sup> 北宋著名蜀籍史學家范祖禹曾借閱過閬州新井蒲氏藏書樓「清風閣」的藏書。

宇文紹奕知資州時稱：「嘗見前漢文字之奧，篆隸之工，鑲金石而傳後世，尚有可考。乃其在中原者，淪於夷狄，後生不可復見。吾家故所貯，吾幸得之，不欲擅而有也。盍傳之是邦，以為學士大夫共之。」於是摹刻漢石經及他碑凡五十四卷，覆以石柱大廈，名其堂曰「博雅」。<sup>121</sup> 博雅堂實則起著公共圖書館的作用。

宋代四川的民間藏書家中，有不少典籍宏富的藏書樓，如前面提到的眉州丹稜史大年的五經樓、嘉州犍為王氏書樓和閬州新井蒲氏的清風閣。其中有一些藏書樓，更是起到教化鄉人的作用。

宋初，眉山石昌齡以「蜀人去五代亂，俗未嚮儒」，即其居構層臺以儲書，以經術教子弟，里人化之，絃誦日聞，號曰「書臺石家」。<sup>122</sup> 眉山石氏之石揚休亦喜聚古圖書。<sup>123</sup>

榮州榮德楊處士，為虞部郎中楊見素之子，處士築室百楹，哀輯古今書史萬卷，引內外良子弟數十人，召耆儒之有名業者教之。其子約登皇祐五年(1053)進士。<sup>124</sup>

民間藏書樓最著名者，當數眉山孫氏藏書樓。孫氏本居富春，孫樸徙籍於長安，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府掌書記，其子長儒攝彭山縣令，秩滿罷官，乃家於眉山。於是「大治居處，又構重樓以貯書，日延四方豪彥講學其間。于時蜀人號為『書樓孫家』」。光啟元年(885)，唐僖宗曾御武德殿，書「書樓」二字賜與孫氏。<sup>125</sup>

<sup>118</sup> 《丹淵集》，卷三九〈龍州助教郭君〔友直〕墓誌銘〉，頁290。

<sup>119</sup> 《方舟集》，卷一六〈穆承奉〔深之〕墓誌銘〉，頁二二上至二四上(總頁718-19)。

<sup>120</sup> 《宋史》，卷二九八，頁9900。

<sup>121</sup> 張震：〈博雅堂記〉，載《光緒資州直隸州志》，卷二九，頁一三上至一三下(總頁932)。

<sup>122</sup> 《淨德集》，卷二二〈石公〔洵直〕墓誌銘〉，頁四上至七下。另劉鼎〈王夫人墓誌銘〉稱為「書臺石氏」，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一〇〇，頁一五下(總頁1257)。

<sup>123</sup> 范鎮：〈石工部揚休墓誌銘〉，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一〇，頁二上(總頁156)。

<sup>124</sup> 《丹淵集》，卷三八〈榮州楊處士墓誌銘〉，頁282-83。

<sup>125</sup> 蘇頌：《蘇魏公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三〈孫公〔抃〕行狀〉，頁一上至一八下(總頁675-83)；卷五五〈孫公〔抃〕墓誌銘〉，頁一〇上至一七上(總頁592-95)。《鶴山集》卷四一〈眉山孫氏書樓記〉稱「樓建於唐之開成」(頁352)，開成(836-840)為唐文宗年號，顯然有誤。

歷五代喪亂，孫氏已四世不仕，至孫抃始脫農事，而讀其家藏書，中宋仁宗天聖八年進士甲科。孫抃官至參知政事，卒後，其子「遵奉遺誠，卜葬開封，不復西還」。<sup>126</sup>子孫遂為鄭州管城人。<sup>127</sup>

然而孫氏為眉山著姓大族，孫氏書樓在宋代一直延續下來。前後蜀時，孫氏書樓毀於災。長儒五世孫降衷於後周時遊河洛，與趙匡胤相識。趙匡胤做皇帝後，於建隆(960-963)初特授孫降衷為眉州別駕，降衷於是購書萬卷還眉山。孫降衷之孫，孫抃從兄孫闢又入京城蒐購圖書，捆載而歸，並於其居所復建重樓以藏之，時在仁宗天聖初。「比歲，樓又毀於災，書僅有存者」。南宋時，孫闢六世孫再建書樓，其規模較舊樓更大。且覺藏書不廣，乃赴都城杭州，「傳抄貿易，以補闕遺」。<sup>128</sup>藏書家歷代有之，宋代更盛，但能持之久遠者卻罕。故魏了翁在應孫氏之請而寫的〈眉山孫氏書樓記〉中慨嘆道：

昔人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梁隋之盛，或壞於火，或覆於砥柱。唐太、元〔玄〕、文、昭之盛，或毀於盜，或散於遷徙。本朝之初，如江元叔〔正〕所藏，合江南及吳越之書，凡數萬卷。而子孫不能有之，為臧僕盜去與市，人裂之以藉物者，不可勝數。余嘗偶過安陸，亦得其吳越省中所藏《晉史》，則佚於它人者可知。安陸張氏得江書最多，其貧也，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溥〕初相周世宗，多得唐舊書，李文正〔昉〕所藏亦為一時之冠，而子孫皆不克守也。宋宣獻〔綬〕兼有畢文簡〔士安〕、楊文莊〔徽之〕二家之書，可敵中祕之藏，而元符〔1098-1100〕中蕩為煙埃。晁文元〔迥〕累世之蓄，校讎是正，視諸家為精。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1114〕之災，尺素不存。劉壯輿〔義仲〕家於廬山之陽，所儲亦博，今其子孫無聞焉。南陽开氏之書凡五十篋，則盡歸諸晁氏。嗚呼！斯非天地神人之所靳者與？而孫氏之傳，獨能於三百年間，屢絕而復興，則斯不亦可尚矣夫。<sup>129</sup>

孫抃登仁宗天聖八年進士第，就是「讀其家書，以舉進士」的。<sup>130</sup>「自文懿〔孫抃諡號〕以來，進士鼎甲者凡三人，而與賓薦取科第登顯官者又不知其幾」。<sup>131</sup>其實，書樓不僅使孫氏受益，也推動了地方文化教育的發展。孫長儒於唐代始建書樓，即「日延四方豪彥講學其間」。<sup>132</sup>宋仁宗天聖初孫闢復建書樓，「又嘗除塾為師

<sup>126</sup> 《蘇魏公文集》，卷五五〈孫公〔抃〕墓誌銘〉，頁一六上（總頁595）。

<sup>127</sup> 《文忠集》，卷二九〈孫公昭遠行狀〉，頁六下至一三下（總頁318-21）。

<sup>128</sup> 《鶴山集》，卷四一〈眉山孫氏書樓記〉，頁353。

<sup>129</sup> 《鶴山集》，頁353。周密在《齊東野語》卷一二〈書籍之厄〉中，亦提到諸多宋代名家藏書遭受焚毀散佚之厄運。比較之下，更可凸顯眉山孫氏書樓之價值。

<sup>130</sup> 《蘇魏公文集》，卷五五〈孫公〔抃〕墓誌銘〉，頁一六上（總頁595）。

<sup>131</sup> 《鶴山集》，卷四一〈眉山孫氏書樓記〉，頁353。

<sup>132</sup> 《蘇魏公文集》，卷六三〈孫公〔抃〕行狀〉，頁一上（總頁675）。

徒講肄之所，號『山學』。於是士負笈景從，而書樓山學之名聞於時矣。<sup>133</sup>孫闢「請成都何維翰主持教務，召聚四方學生，制有『公養之法』；當時有名望的范鎮、石揚休、蒲師孟諸人，都在這裏任過教」。<sup>134</sup>何維翰疑即成都著名的私學教師任維翰，成都名學者蒲遠猷、章惇曾從其學。<sup>135</sup>石揚休(995-1057)出自著名的眉山「書臺石家」，本身亦喜聚書，前已述及。揚休於景祐間中進士甲科，與范鎮同科，有著作多種。蒲師孟亦是著名藏書家，前亦已述及。南宋晚期孫氏再修復書樓，除增廣藏書外，並「竭其餘力，復興山學」。<sup>136</sup>

由此可見，孫氏書樓並非是一個單純的私人圖書館，它同時也是一個私學教育機構，自建樓之始，便發揮著傳播學問的作用。宋代眉州文物鼎盛，人才輩出，當有孫氏書樓的一份功勞。眉山石氏書臺、榮州榮德楊氏書屋，亦有私學教育機構之功能。<sup>137</sup>

### 餘論

史學家吳晗曰：「自板刻興而私人藏書乃盛，其中風流儒雅，代有聞人，宿史枕經，篤成絕學。甚或連楹充棟，富誇琳瑯，部次標籤，搜窮二酉，導源溯流，蔚成目錄之學。其有裨於時代文化，鄉邦徵獻，士夫學者之博古篤學者至大且鉅。」<sup>138</sup>據上述宋代四川民間藏書的情況，可知吳氏之言不謬。一地之私人藏書興盛與否，關係地方文化之發展極大。

<sup>133</sup> 《鶴山集》，卷四一〈眉山孫氏書樓記〉，頁353。

<sup>134</sup> 吳天墀：〈宋代四川藏書考述〉，頁194。

<sup>135</sup> 蒲遠猷：〈自撰墓誌〉，載《宋代蜀文輯存》，卷一七，頁一〇上(總頁256)；《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四〈蒲仲輿〔遠猷〕墓碣〉，頁275；《淨德集》，卷二八〈沖退處士章惇行狀〉，頁三上至四下。嘉慶《四川通志》(臺北：京華書局，1967年)卷一四四〈人物·何維翰傳〉記：「何維翰，字叔良，成都人。南省不第，遂不復應舉，居鄉里，以教導為事。薛簡肅奎薦其文行，賜粟帛。韓魏公琦安撫劍南，時蜀大旱，維翰募民間，得米千斛以助賑濟。琦嘉之，薦授四門助教，辟府學說書。」(頁一五下〔總頁4378])薛奎於仁宗天聖四年至六年(1026-1028)知益州，其時任維翰的學生蒲遠猷為十六至十八歲。何維翰很可能就是任維翰，「何」乃「任」之筆誤。

<sup>136</sup> 《鶴山集》，卷四一〈眉山孫氏書樓記〉，頁353。

<sup>137</sup> 周少川《藏書與文化》一書所附「藏書樓號一覽表」中，宋代四川的民間藏書樓無一收入。黃建國、高躍新主編的《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中，無人提及宋代四川的藏書樓。任繼愈主編的三卷本《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宋代著名私人藏書樓〉一節，也未提到宋代四川的藏書樓(頁794-826)。傅璇琮、謝灼華主編的兩卷本《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年)，則提到眉山孫氏書樓和閬中蒲氏清風閣書樓(頁361, 364)。

<sup>138</sup> 吳晗：〈兩浙藏書家史略〉，「序言」。該文原刊《清華週刊》第三十七卷第九、十兩期文史專號(1932年)，署名辰伯，收入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引文見該書頁1-2。

茲將前述宋代四川藏書家情況製成一覽表，以作進一步的分析。

宋代四川藏書家情況一覽表

序號	姓名	年代	居住地	藏書情況	學術情況	科宦情況	是否移民
1	毋昭裔	五代入宋	成都	性好藏書	精經學	後蜀宰相	是
2	句中正	929-1002 五代入宋	成都華陽	喜藏書無餘財	精字學	孟蜀進士	是
3	彭乘	985-1049 北宋	成都新繁	萬餘卷	史學 校讎	進士	是
4	杜鼎昇	北宋前期	成都		校讎	不仕	是
5	李定	北宋前期	成都郫縣	獻書朝廷	?	?	
6	郭友直	1008-1071 北宋	成都	萬餘卷	文史 樂學	賜進士	是
7	郭絳	北宋中期	成都	惟好書無他嗜	經學 校讎	子登上舍第	是
8	楊匯	北宋中後期	成都	萬卷	典章譜牒	不仕	
9	郭叔誼	1155-1233 南宋	成都廣都	萬卷	文史 理學	進士	是
10	宇文虛中	1079-1146 北南宋	成都	藏書世家	文學	進士 執政	是
11	宇文時中	北南宋	成都	獻書朝廷	?	官至龍圖閣	是
12	宇文師申	1111-1162 南宋	成都	治室廬陳圖書	?	以蔭入仕	是
13	宇文紹奕	南宋	成都	萬餘卷	史學	入仕	是
14	書樓孫氏	唐末至南宋	眉州眉山	上萬卷	經學	登第者多	是
15	書臺石家	兩宋	眉州眉山	建有藏書樓	?	登第者多	是
16	程氏	兩宋	眉州眉山	築閣聚四庫書	?	登第者多	是
17	蘇洵	1009-1066 北宋	眉州眉山	數千卷	文學	二子登第	是
18	史大年	1026-1090 北宋	眉州丹稜	五經樓 萬卷	?	科舉不第	是
19	史九齡	1043-1117 北宋	眉州丹稜	性嗜書多所藏	?	不仕	是
20	孫道夫	1095-1160 南宋	眉州丹稜	蓄書30年	文學	薦舉入仕	
21	李燾	1115-1164 南宋	眉州丹稜	數萬卷	著名史學家	進士	是
22	楊泰之	1169-1230 南宋	眉州青神	數萬卷	經學家	進士	是
23	杜莘老	1107-1164 北南宋	眉州青神	所蓄幾萬卷	經學	進士	是
24	師民瞻	北南宋	眉州彭山	數千卷	文學	進士	是
25	閻太古	北宋	蜀州晉原	輕財重書	經學	子登進士第	是
26	李平	北宋	蜀州	惟聚書教子	?	子登進士第	
27	趙薦	1034-1081 北宋	邛州依政	俸祿多購書畫	喜賦詩	入仕	
28	章寅臣	1156-1225 南宋	邛州蒲江	嗜儲書	經史	不仕	
29	魏了翁	1178-1237 南宋	邛州蒲江	數萬卷	著名理學家	進士 執政	

表(續)

序號	姓名	年代	居住地	藏書情況	學術情況	科宦情況	是否移民
30	高斯得	南宋晚期	邛州蒲江	所藏僻書尤多	文史	進士 執政	
31	譙氏	南宋	邛州蒲江	嗜書 多所儲	經史	進士	
32	章得茂	南宋中期	漢州綿竹	近思堂數千卷	經學	吏部尚書	
33	劉諷	北宋中期	簡州	喜藏書而知名	?	進士	是
34	李心傳	1167-1244 南宋	隆州井研	所藏僻書尤多	著名史學家	賜進士	
35	李道傳	1170-1217 南宋	隆州井研	同上	史學 理學	進士	
36	李性傳	南宋	隆州井研	同上	史學 理學	進士	
37	牟子才	南宋	隆州井研	同上	史學 理學	進士	
38	田錫之父	北宋	嘉州洪雅	數千卷	術數	子登進士第	是
39	王氏	北宋	嘉州犍為	萬卷	?	?	
40	何中	北宋	永康軍	以聚書為能	喜賦詩	孫登進士第	是
41	穆深之	1106-1174 北南宋	彭州	萬卷	理學	累舉不第	
42	趙樞年	1106-1160 北南宋	彭州	千卷	經學 文學	累舉不第	
43	李仲侯	1063-1141 南宋	綿州	萬卷	文學	科舉不第	
44	楊恕	1037-1097 北宋	普州安岳	?	經學	?	
45	劉儀鳳	1110-1175 南宋	普州	萬餘卷	工於詩	進士	
46	馮知微	南宋	普州	萬卷	?	科舉不第	是
47	李石	1108-? 南宋	資州	築書臺富藏書	經學 博物	進士	是
48	趙逵	1117-1157 南宋	資州	喜收聚古書	文學	進士第一	是
49	李處和	南宋	資州	儲書教子	?	科舉不第	
50	馮玠	1035-1070 北宋	遂州遂寧	喜儲書	?	未及第而卒	是
51	蘇振文	?-1233 南宋	遂州遂寧	數萬卷	經學 史學	不仕	是
52	楊處士	北宋	榮州榮德	藏書樓 萬卷	博學 工詩	子登進士第	
53	程賁	北宋	瀘州	藏書50餘年	經學 校讎	不仕	
54	蒲氏	北宋	閬州新政	清風閣書樓	有史才	進士	
55	陳漢卿	1009-1070 北宋	閬州閬中	每傾資購書	喜為歌詩	以蔭入仕	是
56	張獻忠	1106-1157 北南宋	恭州	聚詩書教子	?	子應進士舉	

關於此表，有幾點需要說明：(一) 年代欄之「北南宋」，指生活於兩宋之際者；(二) 五代入宋的孫光憲雖為蜀人，但寓居他地，其藏書不在四川，故未列入表中。表中所列藏書家，亦可能因任官出蜀而藏書隨之，但其藏書在入仕前後曾置於其

故家，則是肯定的；(三)四位宇文氏，李心傳三兄弟(道傳、性傳)及魏了翁、高斯得叔侄同族，可視為類似眉山孫氏、石氏那樣的藏書世家；(四)魏了翁之藏書量是以鶴山書院所藏十萬卷估算，因書院藏書是以魏氏家藏為主的；(五)井度與晁公武雖非蜀人，但其長期寓居四川，所藏書又多得之於當地，包括沈立、陸游，他們與四川有關的聚書行為，雖未列入上表，仍應視為宋代四川藏書情況的一部分，一併加以考察；(六)杜鼎昇事蹟見《茅亭客話》卷一〇〈杜鼎昇〉；(七)楊天惠〈樂善郭先生誄〉記：「〔郭絳祖先〕其遷徙入蜀，初莫詳也，今為成都人。」<sup>139</sup>故郭絳是否唐五代遷入蜀者，不能確定；(八)宋代學術鼎盛，印書業發達，文人學者大多藏書不菲，但能留下記錄的卻不多，故上表所列，只是宋代四川藏書家的一部分而已，而且限於筆者所涉獵。<sup>140</sup>儘管如此，我們仍可據此概見宋代四川藏書之情況，及與地方文化發展之關係。

上表所列宋代四川藏書家中，唐五代遷蜀家族有三十人(氏，下同，郭絳除外)，佔總數超過一半。這可以印證前引陳樂素的推論：「自經安、史、黃巢之亂，長安文化移植於蜀，爰及五代，遂呈異彩。……人既移於蜀，物亦必隨之，有唐之書，入於蜀府者恐不鮮。」

居於成都府路的有四十三人，佔總數約77%。其中成都和眉州兩地的又有二十三人。成都府和眉州是四川刻書業最發達的地區，<sup>141</sup>民間藏書也以這兩地為盛。北宋人劉錫〈至道聖德頌〉稱成都是：「犬子、揚雄之故里，文翁石室以猶存，所以時有才名，好藏文籍。」<sup>142</sup>南宋蜀籍名學者劉光祖為眉山成叔陽所編《唐三百家文粹》所作序云：「往時有《唐文粹》百卷，姚鉉之所銓纂，已倍於古；今眉山成君乃增益之至三百家，為四百卷。嗚呼，何其多也！……眉士〔山〕鄉多藏書，叔陽所以盡力乎其間，豈徒然哉？」<sup>143</sup>以上所引當時人的文字，已稱譽成都和眉山地區藏書風氣盛，並認為兩地出人才、學風鼎盛，均與多藏書有關。

<sup>139</sup> 《宋代蜀文輯存》，卷二六，頁二三上(總頁371)。

<sup>140</sup> 近十幾年有數人對宋代藏書家史料予以補錄，計有方建新：〈宋代私家藏書補錄〉，《文獻》1988年第1期，頁220-39；第2期，頁229-43；劉漢忠：〈宋代私家藏書拾遺〉，《四川圖書館學報》1989年第3期，頁68-72；〈宋代私家藏書拾遺補〉，《四川圖書館學報》1990年第4期，頁61-62；林平：〈宋代私人藏書家補遺〉，《四川圖書館學報》1990年第1期，頁71-74；范鳳書：〈宋代私家藏書再補遺〉，《四川圖書館學報》1992年第2期，頁53-68。范文中提到的文同、楊椿、李攸等蜀籍藏書家，因史籍記載不詳，故本文未列入。

<sup>141</sup> 張秀民：〈南宋(1127-1279)刻書地域考〉；劉少泉：〈唐宋蜀刻版本述略〉，《四川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4期，頁104-9。

<sup>142</sup> 載楊慎(編)、劉琳、王曉波(點校)《全蜀藝文志》(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卷四五，頁1369。

<sup>143</sup> 《蜀中廣記》，卷一〇〇「唐三百家文粹四百卷」，頁六下至七上(總頁610-11)。成叔陽  
〔下轉頁57〕



宋代蜀籍藏書家的年代跨度，由唐末至南宋末年，計有五代入宋二人，縱貫兩宋三家，北宋二十二人，兩宋之際七人，南宋二十二人。於此可見，南宋四川不僅藏書家未減少，其藏書規模且更大，不僅鶴山書院之十萬卷無與倫比，著名的眉山孫氏書樓在南宋重建時，其規模亦較舊樓更大，藏書更廣。

上述藏書家中，除成都杜鼎昇、李定、嘉州犍為王氏、彭州穆深之、普州安岳楊恕、瀘州程賁六家情況不明，楊匯一家無仕宦紀錄外，或本人中進士，或家族成員有登第者，長期保有藏書的眉山孫氏、石氏、程氏和成都宇文氏，其家族更是科宦不斷。這些藏書家，大多學有專長，有的甚至是代表宋代學術水平的大學者，如眉州眉山三蘇、眉州丹稜李燾、隆州井研李心傳、邛州蒲江魏了翁等。而成都、眉州兩地藏書之盛，與兩地人才之盛適成正比。

袁同禮撰〈宋代私家藏書概略〉一文云：「印書之地，以蜀、贛、越、閩為最盛，而宋代私家藏書，亦不出此四中心點之外。印售之書既夥，藏之者亦因之而眾。北宋藏書家多在四川、江西，南宋藏書家多在浙江、福建，此其大較也。」<sup>144</sup>袁氏肯定四川為宋代印書和藏書的四個中心之一，但在文中卻未提及一位蜀籍藏書家之名。其所云北南宋藏書家之分佈，至少就四川而言，並不準確。徐雁在《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之代序〈全面展開中國歷史藏書的研究〉中，亦採用了袁氏關於藏書家分佈之說法。<sup>145</sup>前述井度、晁公武在四川蒐藏書籍及陸游購買大量蜀版書籍歸鄉的情況，即可說明南宋四川書籍印行之盛。實際上，南宋四川藏書較北宋更盛。又楊遠在《西漢至北宋中國經濟文化之向南發展》一書中，雖然談到四川為宋代雕印書籍的中心之一，但他以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為基礎，增補製作之「兩宋民間藏書家簡表」，竟無一位蜀籍藏書家之名。<sup>146</sup>任繼愈主編的《中國藏書樓》中所列「顯著而重要」的宋代私人藏書家，四川僅有劉儀鳳一人。<sup>147</sup>周少川《藏書與文化》一書中關於宋代私家藏書部分，亦極少提及四川藏書家。很顯然，學者們對宋代四川藏書興盛的情況不甚了了。

潘美月在《宋代藏書家考》中統計，宋代四川藏書家僅有七人氏，即孫光憲、眉山孫氏、杜鼎昇、宇文季蒙（時中）、宇文虛中、劉儀鳳、李心傳。在潘氏所列十

〔上接頁56〕

亦可能藏書不菲。另《文獻通考》卷二四八〈經籍考〉記「後村劉氏序」（頁1959上）。「後村」為閩籍學者劉克莊之號，疑誤。劉光祖號「後溪」。

<sup>144</sup> 《圖書館學季刊》第2卷第2期（1928年3月），頁187。

<sup>145</sup> 徐雁、王燕均（主編）：《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4。

<sup>146</sup> 楊遠：《西漢至北宋中國經濟文化之向南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670-79。

<sup>147</sup> 《中國藏書樓》，頁761-93。

三個地區中，四川少於浙江(三十一)、江蘇(十八)、江西(十五)、河南(十三)、福建(十二)，而與安徽(七)並列第六。潘氏云：「藏書家地區之分佈，略可窺見各地文化盛衰之消息。」<sup>148</sup>其言不假，而浙江、江蘇、江西、河南、福建亦確為宋代學術發達地區。但如果根據潘氏之統計，則四川就算不上是學術最興盛的地區了，四川雖然排名在上述五個地區之後，其七人氏之藏書家數，較之浙江的三十一人，就相差太遠了。可是，如果加上本文所列、潘氏漏收的藏書家四十餘人，則四川共有五十餘人氏(包括同族者，不算孫光憲)，反超出潘氏所收浙江藏書家數而居第一(當然浙江亦可能再尋出一些藏書家來)，其中僅寫明藏書萬卷以上及建有書樓的藏書家庭，宋代四川即達二十戶以上。吳晗在《兩浙藏書家史略》中統計兩宋浙江藏書家為三十三人，包括父子兄弟同一家者，<sup>149</sup>與潘氏的統計相近。但潘氏統計之四川藏書家數，其誤差就太大了。當然，潘氏所統計的其他地區亦可能有不少闕漏。如潘氏所錄宋代山東藏書家為五人，王紹曾、沙嘉孫著《山東藏書家史略》則統計為二十一人，包括南宋時居於江南的山東籍人士如周密、辛棄疾及寓居四川的晁公武。<sup>150</sup>又潘氏所錄宋代江蘇藏書家為十八人，反不及比其早四十餘年前吳晗撰《江蘇藏書家史略》所收二十二人之數。<sup>151</sup>

考慮到歷史文獻的流失，以現存文獻記錄統計整個宋代或某一地有多少藏書家，顯然是不恰當的，於其他時代亦然。現存文獻記錄只能給我們提供一個概貌，各地現存藏書家的數目，並無絕對的可比性。不過，如果連現存文獻的把握都諸多闕漏，則得出的研究結論自然會產生很大的偏差。

經過上述考訂，則四川與江浙一樣，都是宋代藏書最盛的地區之一，當為事實，而這才是與四川在宋代的學術文化地位相稱的。唯有釐清宋代四川民間藏書家的情況，我們才能對宋代四川地方文化發達的原因，作出更合理的解釋。

<sup>148</sup> 《宋代藏書家考》，頁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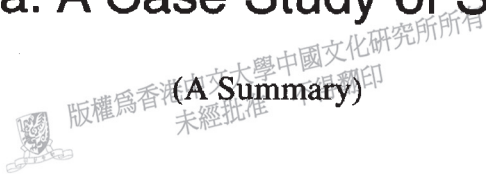
<sup>149</sup> 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頁4。

<sup>150</sup> 王紹曾、沙嘉孫：《山東藏書家史略》(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24-44。潘氏將周密歸入浙江藏書家較妥。

<sup>151</sup> 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頁117-234。



#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vate Librar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in So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Sichuan



(A Summary)

Zou Chonghua

It is generally held that books are indispensable for scholars who pursue intellectual inquiry and promote education. Apart from the tremendous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in publishing, collecting and preserving books, many individuals are also enthusiastic in collecting and preserving books.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vate libraries had a long tradition in pre-modern China.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vate libraries had significantly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Under the Song dynasty, most of the private libraries were located at the four major centres of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e., Kaifeng in Henan; Hangzhou in Zhejiang; Jian'an in Fujian; and Chengdu in Sichua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ssess the impact on local culture brought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vate libraries in Sichuan. Two major questions will be raised. First, since Sichuan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reg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in Song China, how was it ranked in term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vate libraries? Second, in what way did such a practice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in Sichuan?

